

“向着法西斯开火”等歌曲，不理睬路旁林立的军警和前面架设的机枪，奋力向省府大院冲去。大约有100人冲进去后，宪兵就关闭了省府大门，早已埋伏好的军警和便衣特务都跑出来，三四个对付1个学生，挥动枪托、皮鞭、铁条、木棒、刺刀等凶器，向他们打来。同学们一边反抗，一边高喊“不准打人！”“打倒特务！”“王陵基杀人了！”王陵基是早有预谋的，转眼之间，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均被军警用绳索捆绑起来。许多人被打伤，有的血流满面，有的肋骨折断。川大同学游训天（女）、李维品、罗宗章三人遭军警刺成重伤。游训天当即被同学抢救出来，送往医院。

省府大门外的宪兵、警察、保安团也同时出动，向众多的学生发动袭击，冲散了游行队伍，并在督院街、走马街附近挨家搜查抓捕学生，这场血腥镇压一直持续到黄昏。在军警追赶搜捕过程中，督院街附近老百姓都同情学生，许多居民不怕担风险，急忙打开店门、家门，让学生躲避，有的指引翻墙、走小巷的撤退路线。有的人家伪称学生是他们的亲人，骗过特务的魔爪。在群众的支持下许多同学得以脱险。

被关押在传达室的谈判代表，听见外面迸发出怒吼声、殴打斥责声，又见到被武装的军警押着捆绑成串的同学，昂首挺胸地进入传达室对面的大过道，断定王陵基果然下毒手镇压学生了，心情十分焦急。这时，何北衡推门而入，双手一摊说：“你们的人呢？都散了，这下还谈啥子！”叶麟代校长焦急地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何答：“外面有个学生扯警察的枪，警察开出去把他们打散了。”代表们愤怒地进行驳斥，指出这是他们蓄意镇压学生的借口，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刻释放全体被捕同学；把受伤同学立即送医院治疗；让代表撤回学校。叶麟也向何提出由他领代表回校。这时，王陵基又走出来恶狠狠地说：“叫他们代表过去看，哪些是学生？哪些是老百姓？是学生的依法惩处，

是老百姓的就地枪决。”当何北衡跟着叶麟和5位学生代表一起走向被绑押的同学时，这100多位同学怒吼道：“为啥打我！为啥捆我！”要求军警把绳子解开。警官被迫解开了绳子。代表们见罗宗章头冒鲜血，李维品受重伤腰也直不起来，要求何北衡叫来担架送进医院。代表们登记了各自学校被捕同学的姓名。当晚，叶麟领回川大代表刘光书、何骏生。华大校长也领回罗民什、徐玉良。成华代表苏世沛则一直被扣押到最后才释放。

在这场血腥镇压中，共有学生200多人被打，132人被捕（其中女学生20多人），包括川大101人，华大18人，成大3人，其他学校10人。

王陵基上任主川第一天，就制造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四·九”血案，再次暴露出“王屠户”的凶恶嘴脸，使他一开始就陷入广大青年学生和市民群众的声讨和挞伐之中；蒋介石依靠王来进一步严密控制四川的图谋，也一开始就遭到沉重的打击。

#### **四、声势浩大的反迫害斗争**

“四·九”血案的消息，当晚就传遍了整个成都，并很快扩散到全川、全国，在各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和副书记彭塞就商量了几条紧急措施。当天下午，在华大民协同学刘元彦的家中召开了有关人员的紧急会议，要求各校组织力量向社会宣传事件真象，揭露王陵基屠夫面目；立即组织“四·九”血案后援会，营救被捕同学，并到医院慰问受伤的同学；鉴于川大党总支副书记、民协负责人严明开已被捕，由倪受禧同志代理总支书记，由章文伦同志主持民协和后援会工作；通知刘光书同学暂时隐蔽起来。市委当晚又召开了会议，决定：提出“维护人权，反对迫害”的口号；布置各校党组织继续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大、中学生的罢课斗争，要求学校当局保释被捕同学；向社会揭

穿事件真象，争取各界声援；向外地各大专学校发电报，要求各大城市支援，直至被捕同学全部释放；同时，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利用矛盾，逼王陵基释放学生。市委决定及时传达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后援工作开始了，反饥饿斗争进一步发展成为反迫害斗争。

根据市委洪德铭、彭塞同志作出的安排，川大党组织进行了紧张的活动，决定当晚即分别在校本部、工学院、新生院、先修班就地召开“声讨‘四·九’血案罪魁祸首王陵基大会”，揭露事件真象，控诉王陵基的残暴罪行，继续坚持正义斗争，开展后援工作。是日晚，校本部在文彬馆召开的声讨大会，由陈仲文主持，李惠清等同学上台进行了声泪俱下的控诉。会上决定成立“四川大学‘四·九’血案后援会”，并选出后援会主席团，成员是：章文伦、陈仲文、贺新民、谷武容、向定和、王德愚、陈万堂、陈才学、李孝碧等（都是共产党员或民协、民盟成员与进步同学）。新生院在法律系大教室召开的声讨大会，由冯江、温少峰等上台讲述了事件经过，控诉反动当局暴行，成立了由王德愚、冯江、邓祥裔等负责的新生院后援会。工学院、先修班均成立了后援会。上述大会，到会群众十分愤怒，一致通过向当局提出四项严正要求：（一）必须立即释放全体被捕同学；（二）赔偿受伤同学的医药费；（三）严惩肇事凶手，将王陵基撤职查办；（四）立即配发平价米。在这些要求没有实现前，从4月10日就开始无限期罢课，同时印发《为“四·九”血案告全国同胞书》。大会结束后，已是晚上11点多钟，后援会主席团在一宿舍继续开会，研究以后行动。决定由文笔学会起草《告全国同胞书》，编印《四九快报》，新生院由“文艺新苗”社编印《四九血报》；由何懋金组织同学去医院看护受伤的同学；指定郝耀青携带食品前去看望慰问被捕同学，并传送校内行动消息；组织宣传队到工厂、学校、街头进行宣传等。

在川大校本部召开的声讨大会上，与会者要求校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发布罢课的通告。当时学生自治会理事长罗宗章（民协会员）尽管头部已受重伤，仍及时召开了自治会，但由于特务学生黄成章（解放后已镇压）利用其窃取副理事长身份，坚决反对罢课，并抢走了学生自治会的图章，无法发布罢课通告。在这种情况下，后援会主席团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以自身的名义，堂堂正正地公开宣布罢课，开展后援工作。当天晚上，在党员教师倪受禧、张万禄等的发动和进步女同学逐一登门请求下，许多教授教师助教也都签名声援学生的正义行为。4月10日大家见了罢课通告，很少有人去上课，许多进步女生还守在各教室门口，劝阻前去上课的老师和学生。为了进一步巩固罢课斗争，还由李万祺同学主持召开了系、级代表会，通过罢课决议。4月13日，川大教授会又发表宣言，谴责反动当局镇压学生的罪行，宣布罢教。学校当局在特务头目韩伯勋的把持下，于10日召开了紧急行政会议，强行贴出校告，要求全校学生照常上课，否则开除学籍，还有不少混入川大的以破坏革命学生运动为职业的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也妄想破坏罢课。根据组织安排，一些进步女同学针锋相对，到各个教室门口守着，不准他们进去。由于后援工作声势浩大，师生一致，顶住了校方的公开威胁，反动学生也不敢进教室上课，这就顺利地开展了川大历史上第一次全校规模的罢课斗争。

在川大、华大等学校紧张地开展后援工作的同时，王陵基为了掩盖他的反动罪行，稳住他在四川的统治，也在采取严密封锁“血案”消息，造谣诬蔑、威胁恐吓等各种手段破坏后援工作。当晚他就下令成都各通讯社、报社（《新新新闻》、《新民报》、《新中国日报》、《四川时报》、《成都快报》、《西方日报》等）不得擅自发布有关报导，不得接受学生提供的稿件；规定有关新闻只能由政府当局发布，同时要邮局严格检查外寄的

信件和宣传品。4月10日，《新新新闻》首次发表颠倒黑白的消息，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暴行说成是“为维持秩序计，当场挡获学生数十人。”同日，国民党中央社还发布了王陵基的书面发言，造谣说游行请愿的学生“捣乱铺面”，“殴打警察，情势异常紧急，守卫军警不得不予逮捕。”妄图洗刷他自己的血腥罪行。王在同一天还召集成都各大、中学校长及教育厅高级职员训话，叫嚷：“要严肃学风，如发现共匪潜伏分子，应立即报告拘捕。”4月11日，成都各报刊登了警备司令部提供的所谓审讯结果，诬指被捕学生中有“奸匪”32人，其中川大26人，华大4人，成华2人。妄想为进一步迫害进步学生制造舆论。4月13日王陵基又在省政府召开记者招待会，胡说学生要求配给平价米是“共匪阴谋策动5月暴动，此其序幕……。”他还派何北衡到医院用生命安全来威胁受重伤的游训天同学，不准她说出事件真相。同日，警备司令部将川大、华大、成华三所大学的“重大嫌疑分子名单”函送各校，要求对这些同学严加监视。14日，国民党中央社又公布了所谓“奸匪嫌疑分子”名单50人，其中川大32人，华大11人，成华7人，进行公开恫吓。特务机关还指使在川大的特务学生散布谣言，威胁说政府还要进校逮捕学生；并张贴破坏罢课的标语，撕毁进步学团办的壁报。在图书馆前，进步同学还当场抓获了一个混入川大撕壁报的便衣特务，在审查中，被他夺路从一宿舍前的稻田里狼狈逃走。

血写的罪行是抹不掉的！革命的青年学生是压不垮的！在中共成都市委和学校党总支的领导下，川大广大同学团结一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首先，千方百计地向社会揭露“四·九”血案的事实真相，打破敌人的新闻封锁。从4月10日起，川大校本部、新生院、先修班等就组成了30多个宣传队，到本市各学校、工厂、街道、茶馆等处去散发传单、发表演说；章文伦同学代表川大后援会举行

了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公布血案的始末，呼吁社会舆论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游训天同学忍着伤痛，在病床上控诉了她被国民党军警用刺刀杀伤的事实，驳斥谣蔑她是自己被黄包车撞伤的谣言。何懋金同学还将游训天和其他受伤同学的伤痕、血衣、诊断书等拍成照片，经过市委书记洪德铭修改定稿的《告全国同胞书》和其他控诉、抗议、宣言等文字材料，用从市委借来的手摇滚筒油印机，印出了成千上万份20多期《四九快报》、《四九血报》等，除了由宣传队在本市散发外，还发动进步同学用平安家信等形式，向全国各地寄送。洪德铭还指派何懋金将这些印刷品及照片等收拾成行李包，躲过敌人的检查站，前往内江、重庆等处，分散从两地的邮局、邮筒寄出。同时，市委派华大党支部书记胡庚炳经重庆去南京、上海等地揭穿王陵基的暴行（胡到重庆后得知被捕同学已全部释放始返蓉）。地下党组织通过驻蓉的上海《大公报》记者，把“四·九”血案的消息发往上海。4月10日《大公报》、《文汇报》首先刊登了有关血案的消息报导。川大外文系同学张毅，也用英文写了一篇关于“四·九”血案的报导及游训天的伤势病历等寄给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周报》，很快被刊登出来。同学们还通过香港报纸，把“四·九”消息传播国外。同时，川大后援会表示，如政府不答应学生的正义要求，将派代表乘飞机去南京，到当时正在召开的“国大”会上去控诉王陵基的罪行。并正式发动同学筹集购买飞机票款，短短两天就登记认捐了几千万元，其中新生院登记了3千多万元，由于校长黄季陆提前返蓉，代表未去，此款才未收用）。川大后援会还派代表到四川省参议会、成都市参议会以及省参议长向传义公馆中去请愿，要求他们为民请命，提出弹劾案，罢免王陵基。这些，都使王进一步陷于孤立，有助于营救被捕同学。

在市委领导下，华大、成华、成都理学院、省艺专等大专院校，都先后部分罢课，成立后援会，互相呼应，协同行动。华西

协中、市立女中、川大附中、华美女中、西北中学等校也开展了各种声援“四·九”血案的活动，有的上街游行，散发传单；有的发表抗议宣言，慰问受伤和被捕同学。当时参加罢课和各种形式斗争的学生达1万多人。市委还通过各种渠道，发动在邮电、银行、新闻界的党员、民协成员、海星合唱团团员等参加声援活动，慰问受伤同学。在游训天病房的鲜花及慰问品堆集了整整半个房间。

针对王陵基通过“中央社”公布的所谓“奸匪嫌疑分子”50人名单，市委研究后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一方面将“黑名单”中的党员、民协和民盟成员，暂时转移，以防不测；同时用声明、海报等形式，公开表示抗议。为了打破王陵基的新闻封锁，由何富华（现名何静修）执笔，采取刊登启事的办法，在报纸上发表了声明。这个声明，利用“黑名单”中性别混淆，人名错乱，或早已离校，或本无其人等漏洞，既表示了严正的抗议，又进行了辛辣的揭露，使王陵基和特务机关大出其丑。

王陵基的血腥罪行被彻底揭穿了，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厦门、广州、杭州、唐山、昆明、重庆等城市的许多大学革命团体和学生及台湾同胞均纷纷来电来信声援，表示强烈抗议国民党军警宪特毒打逮捕成都学生的暴行。各界人士还捐赠了大量的现金接济“四·九”受难同学，仅川大就先后收到捐款12亿元（法币）。如此声援抗议的浪潮，给成都学生反迫害斗争以极大的支持。

成都地下党领导下的“四·九”运动及全国各地学生的支援和斗争，给国民党正在南京召开的伪装“民主”的“国大”和准备“竞选”总统的蒋介石以迎头痛击，弄得他们坐卧不安。4月10日，国民党政府社会部长谷正纲向大会报告了成都和北平两地同在4月9日发生了学生运动，当即引起“国大”代表们的震惊。教育部立即密电各省教育厅要“严加防范”。蒋介石则急令正在

出席“国大”会议的川大校长黄季陆赶回成都，设法尽快平息学生的抗议活动。

当时，黄季陆还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但他与王陵基在国民党内是不同派系，素有矛盾。黄长川大期间，学校有一定发展，他也有以此为政治资本问鼎全川的意向。这次“四·九”血案，川大首当其冲，被搞得很不稳定，黄季陆匆匆返蓉显然是想控制住王陵基造成的被动局面。洪德铭及时和川大党组织研究，决定争取并通过黄营救被捕同学。4月13日，川大后援会便有意识派李孝碧、唐万字、李本莲、李满忱、贺龄玺等一大批同学去飞机场，迎接黄校长，当面控诉王陵基的罪行，争取黄的同情和支持。黄季陆当场表示说：“哪个打了我的学生，我找哪个；哪个抓了我的学生，我向哪个要回来。”他回校后，先后亲自找新生院后援会、川大后援会负责人陈仲文、王德愚、邓祥裔等谈话，保证要回全部被捕在押同学，但要求先复课；他又召开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要求复教，均遭到严词拒绝，进步教授谢文炳等还作了义正辞严的发言，坚持先放人，后复教。黄不得不亲自出面去要王陵基释放学生。王因四面楚歌，陷于孤立，才不得不于4月16日释放了包括上了黑名单准备长期关押的同学，并答应了学生请愿的主要条件：每人每月配售平价米二斗三升。

坚持了整整一周的罢课斗争在取得胜利之后始告结束！

## 五、被捕同学的狱中斗争

“四·九”运动中，川大被王陵基扣捕的101位同学，在共产党员、民协会员的组织下，坚强地团结一致，同敌人进行了机智英勇的斗争。

在国民党军警疯狂地抓捕请愿学生过程中，同学们就不断提出愤怒的抗议，他们入狱后相信在外面的广大同学一定会坚持斗争，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同时他们也思考着如何机智地进行这场



特殊的战斗。当时，地下党和民协组织都是极端秘密的，被捕的党员、民协成员首先考虑到，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川大党总支副书记严开明也被扣捕了，但他趁敌人在行动的混乱中，把自己衬衣上别的“总纠察”红纸条撕下丢了；在刘光书等代表登记各校被捕同学名单时，他悄悄叫刘从他裤包内取走了“请愿大会”图章（原准备写标语等使用的）。后在被审问时，他因穿了新衬衣、裤，把自己装扮成富裕家庭的学生，因同情贫穷同学而来游行的，骗过了凶残而愚蠢的敌人，遂在次日（10日）下午就第一批获释。他出来又积极投入后援工作。在“四·九”当天晚上，被捕同学开初都被集中关在省政府秘书处的一个大厅内，只有几条长板凳。因白天游行时，一般穿得都比较单薄，入夜，春寒袭人，又都没有吃晚饭，不少同学挨打受伤，真是冻饿和伤痛交迫。但是，同学们紧紧挤在一起，借以御寒。并悄声地互相鼓励，互相传话：“大家要团结紧，不让敌人把我们分开。”“什么也不要说。”尽管周围站满了持枪上刺刀的军警在看押着，许多同学从未经历过这样残酷的场面，但大家毫无惧色地不时唱起《团结就是力量！》、《义勇军进行曲》、《坐牢算什么》等革命歌曲，互相鼓励歌声此起彼落，彻夜未停，直到天明。

国民党特务机关“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简称省特委会）组织在蓉的各特务组织对被捕学生连夜逐个进行审讯，详细质问每个学生的姓名、别名、校别、年龄、籍贯等。他们按照一份黑名单，凡审讯到在册者，即作记号，另案处理。军统保密局成都站站站长吕尚功和副站长陈子俊，都亲自参加了审讯。审讯结果后，即把男女同学们分别集中在两间房子里。

10日早晨，被捕同学开始向看守士兵做工作，说：“内战不停，物价狂涨，你们关的饷，不但养活不了父母妻儿，自己连饭也吃不饱，还不是和我们一样挨饿受苦？！”有的士兵点点头，看

来取得了他们的同情。有的同学提议，大家凑点钱，请看守士兵上街买些锅魁充饥。看守班长同意，派两个士兵买了一大笊箕锅魁，男同学每人吃了两、三个，留下一部份，就请士兵送给女同学们吃。

同日，川大在校同学绝食一天，用省下来的伙食费买了大量卤肉、面包、锅魁、衣被，连同捐献的法币，由郝跃青（民协会员，1949年12月在重庆渣滓洞监狱牺牲）和伙食团大师傅挑着担子给被捕同学们送去。平时很少讲话，声音也很小的郝跃青，看到被捕同学时激动而愤怒地大声说：“同学们，川大罢课了！全市有些学校也罢课了！”短短数语送去了广大在外同学的关怀和温暖，给被捕同学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可是，他的话未讲完，也被扣捕了。他身上带有油印传单，便悄悄地在被捕同学们中传阅。后来才知道，开始，省府门卫不准进门送饭，郝就找一位在省教育厅工作的万县同乡借来省府证章，才送进去的。经省政府官员追查此事，这位同乡竟被开除而失业了，我地下党组织后来通过社会关系，才为他解决了工作问题。这位不知姓名的勇敢正直的人，支持学生运动，抗议王陵基罪行，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感激。

10日上午，川大教务长、代校长叶麟也来看望被捕同学。他忍不住流出眼泪，声音哽咽，向大家表示：“学校一定要保释你们出去。”这位正直的爱国学者、教授，一直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后来，他也参加了民盟。

同日下午，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一批在他们看来问题不大的学生，其中川大70人，华大18人，成华2人。

4月11日，国民党当局对继续扣押的42名学生再次进行审讯。大家沉着应战，使敌人什么也没有捞着。一个特务问一学生：“你这么年轻就跟共产党跑？”这个同学回答说：“我是基督教徒，咋个会跟他们跑！”弄得特务哭笑不得。

4月12日，川大后援会再次派由教授、同学组成的慰问队，带着慰问品前往探望。他们经过多次交涉，才见到被捕同学。

同日晚上10点过钟，天上哗哗地下着大雨，一个披着黑大氅的警官，带着两个挂枪的警察，用手电筒光照着进行第三次点名（往年只点一次名），他谎称：“你们训导长来保你们回去，凡点到名的，带上你的全部东西跟我来。”可是，点到名的第一个是刘传森。川大同学知道，他在担任校学生自治会理事长时，曾对外发表过反对签订卖国的《中美商约》的声明，大家明白了所谓保释完全是骗局。未被点着名的同学，就把校后援会送来的捐款和食品，全部送给点到名的同学带走，充分体现了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情谊。果然，这些同学竟被五花大绑，由手持步枪上刺刀的一排兵，押上一辆大卡车，在滂沱大雨的黑夜中飞驰而去。这些同学后来说：以为敌人是把我们送集中营或者是枪毙，心一横，便昂首挺胸地站立着。结果，国民党当局是把他们作为“奸匪嫌疑”转押到玉带桥街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牢房，由歪带呢帽的特务们看守。关在这里的共有15位同学，川大有：杨俊、罗承云、刘传森、田育春、杨正本、沙国勋、李明梁、吕启光、单书煌、卓文刚、张铁铮等12人，，华大是陈善英1人；成华是苏世沛、钟俊两人。

4月13日，扣押在省政府内的其他同学则全部释放。

转押在玉带桥稽查处的15位同学，分别关在3间相连的牢房，女同学关在中间，男同学关在两边牢房。生活条件更差，睡的是地上的连铺，吃的是有谷、稗、糠、虫、沙石、鼠屎等的“八宝饭”，而且每天只有两餐，不准亲友同学探望，阴森恐怖，与世隔绝。然而同学们仍很坚强，不断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等歌曲，互相鼓舞。有人轻声朗诵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们作好了

为真理而长期坐牢的准备，强迫自己吃下难咽的“八宝饭”，有时还乐观地互相开玩笑：“你在这里还要长胖呢。”杨俊、罗承云与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关在牢房里，他们怕此人是奸细，十分警惕，商量好只谈日常琐事，不谈政治。罗承云说他是学生伙食团的经理，并装作天真、不懂事的样子，以骗过敌人。他们只有每天放风时间，才互相交换情况，彼此勉励。狱中只有一个华大的女同学，其他男同学过去都不认识她，但大家都像对待自己的姐妹的一样对她特别关心和照顾，随时提醒她保持镇定和警惕，使她受到很大鼓舞。大家团结得十分紧密，斗争的意志非常坚定。

敌人在对这15位同学的审讯中，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特务们威胁说，你不讲出谁是共产党，就要立即枪决。或问：谁指使你出来游行的？总想从谁身上打开缺口，捞点什么。而敌人得到的回答却是“吃不饱饭，所以才来要求配给平价米。”“要吃饭、要活命，要读书，这是人之常情。”“要求平价米，何罪之有？！”有的同学反问：“我们是和平请愿，手无寸铁，你们为什么要调军警，又打人，又捆人，又关牢房……”问得敌人哑口无言。同学们就是这样面对敌人的威胁和狡诈，毫无畏惧，镇定自若，没有让敌人抓住任何把柄。

4月16日下午，国民党当局才被迫全部释放了这15位同学。至此，被捕同学全部出狱。“四·九”血案的后援工作胜利结束。

## 六、“四·九”运动的继续和迎接解放的活动

4月18日上午，川大、华大、成华及部份中学进步学生，在川大列五馆前面召开了“成都市大中大学生慰问联欢大会”。会上，陈仲文愤怒谴责了刽子手王陵基的罪行，热烈祝贺“四·九”运动终于取得胜利。刘传森、杨俊、吕启光等三位出狱同学

讲了话，表示今后将“继续为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而战斗到底！”川大同学李孝碧等为出狱战友献花。省艺专同学朗诵了《献诗》，全诗是：

假如寒冬已到，那春天一定不会遥远。

要是长夜漫漫，呵，黎明也在前面。

欢迎你冲开牢笼的雄鹰，暴风雨中的海燕。

哪怕它风狂雨骤，哪怕它雷鸣电闪，

展翅高飞，战胜这惊涛骇浪，迎接曙光，粉碎这黎明前的黑暗。

联欢大会后，根据中共成都市委的决定还组织了“四·九血案受难同学会，”接收受伤和被捕同学参加。“同学会”发表了《告成都各界人士书》又一次控诉反动政府当局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同时向全国大专院校发出宣言，倡议继续开展反迫害、争生存的斗争。川大同学还在《西方日报》上发表了“四·九血案鸣谢启事”，向关心支持学生正义行动的全国同胞致谢。

“四·九”运动，使中共成都地下党和革命学生队伍经受了锻炼，发展了进步力量，积累了斗争经验，提高了斗争艺术。此后不久，成都又成功地开展了声援小学教师反饥饿的罢课斗争、1949年春中学教师争温饱的运动和举办“四·九”周年纪念晚会等。这些斗争可以说是“四·九”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国民党尽管又采取开黑名单、逮捕、“特种刑庭”传讯等镇压措施，加剧白色恐怖。但是，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不但没有被压下去，反而日益广泛深入地发展，愈演愈烈。在四川大学，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促进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四·九”以后，川大地下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有大批同学参加了“民协”和“民盟”，特别是广大中间同学提高了觉悟，投入了进步学生运动，有些参加了各进步学术团体。从此校内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反动势力处于孤立境地，各系级的进步势力占优势，这些为地下党和“民协”将学运工作重点由学团活动为主转入系级活动为主创造了条件，得以更为广泛地团结和联系广大同学，开展迎接解放的各项斗争。

同时，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大批革命学生陆续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特别是深入农村，传播革命火种，建立和参加人民武装，开展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的游击战争。川大即有数百名革命学生分赴重庆、温江、自贡、乐山、宜宾、万县、绵阳、雅安、西昌、涪陵、永川等地市70多个县。仅在中共川西边临工委领导的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中，就有100多名川大学生。在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粮斗争和迎接解放、保卫人民政权的游击战争中，成为主要骨干或积极分子。有些学生参加川西南游击队，阻击胡宗南残部逃窜的战斗，立了功；有的学生为促进乐山、沐川、青神、马边、犍为等地的顺利解放，作出了贡献。去雅安、西昌等地的学生，到刘文辉的二十四军部队参加策动和准备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在该部起义后配合解放军阻击国民党军残部，和平解放西康的斗争中出了力。这些革命学生在解放后又充实了各地的干部队伍，大多成为骨干力量。

注：1988年4月，川大党委召开“四·九”运动40周年纪念会前，经筹备组章文伦等同志商定，由邓祥裔同志执笔综合亲历“四·九”运动一些同志提供的史料，写成本文。并在会上、会后征求了有关同志的意见，又经川大党史校史办公室核对过部分事实。

(1988年5月写)

# 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 反蒋倒王斗争

张惠昌

## 一、从反对“国大”代表退让办法谈起

### 1. 川康地方势力与蒋介石控制“国大”选举的斗争

1947年春，蒋介石为了挽救其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失败，进一步动员“戡乱”，不顾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决定片面召开所谓“行宪国民大会”（简称国大）。国民党当局对这次选举控制很严，规定：国民党和三青团员限于1947年1月底以前参加重新登记，并不得脱党竞选；无论党政提名、或以选举人签署竞选，都要严加审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设置“选举指导委员会”，由吴铁城、陈立夫、谷正纲、张厉生等负责，名为指导选举，实际上就是对竞选人和选举活动严加控制。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亦设置有选举指导委员会，由黄季陆、李天民、漆中权、李琢仁、陈紫舆、黄仲翔等负责。

这次选举中，蒋介石与地方势力之间在独裁与反独裁、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上，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当局自抗战胜利以后，违反民意，发动内战，出卖国家主权，贪官污吏横行，因而日益丧失民心。加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利之争有增无减。因此，由当局提名的人有些没有当选，与青年党、民社党保证的代表也没有完全选出，国民党当局威信扫地。

---

注：本文作者张惠昌解放前在川康渝“民意代表联席会”和“民众自卫委员会”中均任副秘书长。解放后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系民革成员。